

中图分类号:F83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50(2008)05-0049-10

转型期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规模 不经济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钟宁桦,陈斌开

(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摘 要:本文尝试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高市场集中度、低盈利能力以及高不良资产率并存的事实。文章证明:在政治家主导的经济中,选择垄断性大银行是最优的;当政治家与银行家之间存在利益交换的途径时,政治家与银行家实现合谋,交换的金额取决于双方的谈判能力与合谋获得的租金;进一步,官员政绩考核方式的改变以及金融市场的开放都能削弱这种合谋的力量,并提高社会效率。

关 键 词:国有商业银行;合谋;转移支付

一、引 言

银行体系创造流动性,管理金融资产,并为市场提供金融中介服务。由于银行业的业务依赖于声誉与信用,该领域存在着显著的规模经济。数据显示,核心资本量列世界前 10 位的银行控制了前 100 家银行核心资本总量的近 30%,并拥有前百家银行总利润的 1/3。相似的,前 20 家大银行掌控了超过 45%的总核心资本以及超过 50%的总利润。由此可见,银行规模越大,盈利能力往往越强。

然而,银行业存在规模经济这一特征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按拥有的核心资本量,“四大”国有银行排在世界前 40 位,但是,与其他同等规模的大型银行相比,四大国有银行在盈利能力上存在着明显差距。与国内其他所有制的商业银行相比,国有商业银行同样没有显出规模经济。2007 年国内上市银行相关指标数据表明,在存款总额方面,三家国有商业银行显著高于其他银行一个数量级。然而,它们的净资产收益率位列 14 家银行的中下游,而不良贷款比例显著地高于除了深发展以外的其他所有银行。Lin & Zhang (2008) 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盈利能力、运营效率、资产质量方面都不及国内其他所有制的银行,包括国内股份制银行、合资银行以及外资银行。

中国银行业表现出来的行业集中度和企业利润的不相关性,以及事实上的规模不经济性(谢平,2003)难以在标准的产业组织理论的框架下做出解释。标准理论认为,更高的市场集中度将带来更高的利润(Demsetz and Lehn,1985)。该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市场集中度是企业行为的结果,而垄断来源于竞争与创新。然而,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垄断结构却源自于政治家的偏

收稿日期:2008-06-02

作者简介:钟宁桦(1982-),男,上海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生;

陈斌开(1982-),男,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好和政策。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使得过去 20 多年间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行政干预与市场运作并存。在不同时期,政府对银行的不同干预方式以及干预程度决定了银行业的集中度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的绩效。

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阐释政治家行为作用于银行业结构与绩效的机制,以解释中国国有商业银行高市场集中度、低盈利能力以及高不良资产贷款率并存的事实。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就业以及由就业带来的社会稳定都是考察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方面。Shleifer & Vishny (1994)将科尔纳著名的“预算软约束”的概念内生于政治家能够从就业中获得的政治利益——政治家为了赢得选举而迫使企业雇佣多余的人员,作为回报,政治家通过财政部门给予企业补贴。双方博弈确定冗员以及补贴的数额,而企业人事任命权与财权的不同配置将影响最终博弈的结果。在他们的模型中,掌握着国有企业人事权以及财权的政治家的行为是企业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且正是来自政治家的压力导致了国有企业的低效。

现实中,当政治家迫使国有企业承担了冗员之后,动用财政收入给予直接的补贴并不是支持企业的唯一方式。在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选择通过银行向承担冗员的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特别是在联邦制与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更有激励通过银行而不是财政来补贴国有企业(钱颖一,1998)。随着企业自主权的下放以及税制改革的推行,以税收为支撑的政府财政相对集中能力下降,而与此同时,以民间储蓄为支撑的银行金融能力却迅速加强。从 1978 年至 2004 年,政府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例从 31.2% 下降到 19.3%,而银行存款余额与 GDP 的比例却由 78 年 31.3% 逐年提高至 2004 年的 176.4%,由此出现了“弱财政,强金融”的格局,此格局出现的直接结果是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或者其他超经济的手段对“产权不清”的银行金融资源进行争夺,力图将银行作为支撑政府运行的“第二财政”(巴曙松,2005)。林毅夫(1997,1999,2003)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对这一机制做了描述:政治家迫使企业承担了诸如冗员等的政策性负担,之后,政治家通过银行向这些企业提供廉价资金,由此,政策性负担扩展到了金融体系,而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地位和低盈利能力均内生于企业的政策性负担。

基于以上事实与洞见,本文试图将 Sheifer & Vishny (1994)阐释的机制进行扩展,将政治家谋求政治利益行为的影响从企业延伸到银行体系。我们描绘政治家、银行家和企业家之间的博弈。政治家劝说大银行向承担了冗员的国有企业提供低息贷款,作为回报,他们对银行业实施管制以维系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国有银行的垄断利润越高,政治家动员其拥有的金融资源的能力就越强。这一途径将国有银行的绩效与国有企业的绩效相联。冗员导致了国有企业的低效,而国企的低效造成了国有银行大量的不良资产。政治家的管制行为导致了银行业的垄断格局,而政治家争夺金融资源方式决定了银行的资产利润率以及不良贷款比例。本文以此来解释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市场集中度高但利润低下、不良资产率高的现实。

二、基准模型

我们建立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来分析政治家对于银行业的影响。模型中有三个参与方:政治家、银行家与企业家。政治家为了维持社会稳定而劝说企业家承担冗员 L ,从中,政治家可以获取的政治收益以货币形式表示为 $B(L)$ 。我们假设 $B(L) > 0$, $B(L) < 0$,其经济学含义是给企业施加冗员将为政治家带来正的效用,即,创造更多的就业是良好政绩的一个重要表现;但冗员给政治家带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假设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为 w ,则企业需为冗员支付工资总额为 wL ,作为企业承担冗员

的回报,政治家要给予企业补贴 S 。假设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上获得的利润为零,且企业家的保留效用为零,则由参与约束条件,政治家将安排冗员使得 $wL = S$ 。我们将工资标准化为 1,则 $L = S$,即此后本文以 S 同时表示冗员数以及为此支付的补贴。

政治家向企业提供补贴的一种方式是说服银行家为其提供低息贷款(“拨改贷”),银行家为政府偏好的企业提供贷款,损失利息收益 S 。假设各家银行在自由竞争的情况下只能获得零利润,政治家利用政策对银行业的进入实行了管制,从而使各家银行获得超额垄断收益 Q 。政府的管制力度越大,银行业的超额垄断程度越高,银行的垄断收益越高。也就是说,要获得更高的超额垄断收益 Q ,就需要政府支付更高的管制成本,设管制成本为 R ,则 $R(Q) > 0$,我们进一步假设 $R(Q) > 0$,即管制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

假设共有 N 家银行,政治家要说服一家银行为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的话,要支付劝说成本 $C > 0$ 。银行的利润越高,政府劝说其提供贷款越容易,即 $C(\cdot) < 0$;同时,假设 $C(\cdot) > 0$,即劝说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

综上所述,政治家从企业冗员中获得收益,同时,管制银行业、并劝说银行家以获取给予企业的低息贷款。政治家选择管制成本 R (从而银行业的垄断收益 Q) 以最大化其效用:

$$U_p = B(S) - R(Q) - NC(\cdot)$$

假设各家银行是对称的,则各银行家一方面从政府管制中获得垄断收益 Q ,另一方面,为政府偏好的企业支付低息贷款,损失利息收益 S 。银行家选择提供补贴企业的数额 S (从而政治家可以安排的冗员数)以最大化其利润(效用)函数:

$$U_b = (Q - S) / N$$

三、政治家主导下的均衡

我们首先给出政治家主导下的均衡。这个均衡在两方面是重要的:从事实上讲,改革开放以前,政治家通过直接行政干预决定银行资源的配置,而其后银行业的改革始于打破“大一统”的银行管理体制。从模型上讲,政府主导的情况可视为一方具有绝对谈判力的极端情况,在之后的分析中,我们将以此出发,改变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

假设在此情况下,银行家的选择完全由政治家来决定,即 S, Q 都由政治家决定。

引理 1:均衡时,政治家仅选择一家银行对企业进行补贴。

引理 1 的含义是,政府为了最小化劝说银行家、控制银行资源的成本,选择垄断性大银行来支持企业是最优的。这就解释了在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体系下银行业“大一统”的局面。当时,中国货币信贷体制实行“大一统”的银行管理体制,国内事实上只存在唯一的政府货币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在信贷管理上实行统存统贷,并由计划来决定资金的配置与发放。

在引理 1 的基础上,政治家的效用函数转换为:

$$U_p = B(S) - R(Q) - C(\cdot)$$

银行家的效用函数转换为:

$$U_b = (Q - S)$$

在政治家主导的经济中,银行家的效用为零,而政治家效用最大化。最优性条件为:

$$B(S) = R(Q)$$

$$Q = S$$

(1)

边际收益递减和边际成本递增保证解的唯一性。均衡点可由图 1 来表示:

图 1 中, $Q = S$ 为银行家的参与约束线 (IR), 在这条线上银行的利润为零。政治家在此前提下选择 Q 和 S 以最大化效用。 $B(S) = R(Q)$ 是政治家的最优性条件, 含义是一单位冗员为政治家带来的边际收益 $B(S)$ 等于为管制银行业所需支付的边际成本 $R(Q)$ 。这个简单的均衡条件阐释了改革开放以前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联。1978 年以前, 政府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 直接通过行政手段介入银行体系, 获得大量金融资金, 并通过管制银行业使银行在几乎零利润的条件下运营。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 并以低贷款利率对承担了政策性负担的企业进行隐性补贴 (林毅夫,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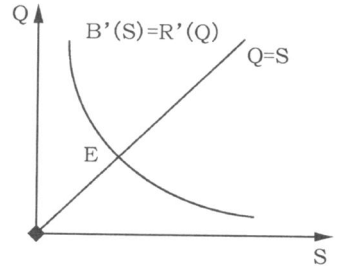


图 1

1978 年之后, 银行体系的改革始于调整中国银行体系的结构和运营方式: 政府以银行信用逐步替代国有企业的配置预算, 并将中国人民银行的的部分职能转移了出来, 其结果便是“四大”国有银行的产生——一个两层次的银行体系代替了之前“单一制”的银行体系。然而, 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前, “四大”银行仍扮演着“第二财政”的角色。数据表明, 1985~1995 年期间, 中国的利差基本一直维持在 1 以下, 远低于同一时期的其他发达国家 (如法国、荷兰、加拿大、日本、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虽身处垄断地位, 能较容易地以较低的利息获得存款 (Q)。但与此同时, 它们必须向承担了较多冗员的国有企业 (以及政府为发展经济而上马的“政绩工程”) 提供大量廉价的资金 (S)。并且, 由于冗员而造成的国企低效 (以及发展项目背离比较优势) 给“四大”银行带来了大量的坏账, 使它们利润率低下而不良贷款率激增。

1985~1995 年期间, 银行业改革围绕着所有制进一步逐步推行。1986 年, 第一家国内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成立。1991 年, 深圳发展银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成为第一家部分由公众持有的银行。1994 年, 政府设立了 3 家政策性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随着银行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政治家主导的模型逐渐转向银行家与政治家“讨价还价”的格局: 国有商业银行与政府合谋, 政府通过“讨价还价”对银行决策施加影响, 而银行以支持经济发展为代价, 增加其分支机构在经济中的支配能力以及聚集和调配资金的能力, 从而实现他们的控制力与垄断收益的提高 (巴曙松, 2005)。

四、政治家和银行家的讨价还价均衡

1. 合谋

我们先假设政治家与银行家有完全对等的讨价还价能力。当政治家与银行家就资源的配置进行讨价还价时, 政治家与银行家间的转移支付 (政治家制定较高的存贷款利差) 自然地出现。我们假设政治家给予银行家的转移支付为 b 。

政治家的效用函数变为:

$$U_p = B(S) - R(Q) - C(\quad) - b$$

而银行家的效用函数为:

$$U_b = Q - S + b = \quad + b$$

我们可以证明, 在转移支付的成本为零的情况下, 政治家主导和银行家主导并不影响均衡的结果。这个结论是科斯定理在本模型中的应用, 我们总结为命题 1。

命题 1:在存在转移支付且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下,Q 和 S 的控制权属于政治家或银行家不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

命题 1 表明,如果我们仅考虑资源的最终配置,我们无需对冗员以及银行金融资源的配置权做出明确的界定。从而我们可以假设政治家和银行家结成联盟,其联盟的效用函数为:

$$B(S) - R(Q) - C(Q - S) + Q - S$$

其最优性条件为:

$$B'(S) = R'(Q) = (1 - C'(Q - S)) \tag{2}$$

这个条件的经济学含义为:在均衡处,

(1)对于联盟整体而言,最后一单位冗员带来的政治收益等于实施进入管制的边际成本:即 $B'(S) = R'(Q)$ 。

(2)在联盟内部,对于政治家而言,从银行处获取低息贷款的边际收益等于劝说银行的边际成本以及帮助银行获取垄断收益而实施管制的边际成本之和:即 $R'(Q) = (1 - C'(Q - S))$ 。

我们可以证明,由最优性条件决定的合谋均衡点是唯一的^①。值得注意的是,合谋均衡点对政治家和银行家而言,而非对社会而言,社会最优及其经济含义将在后文做详细的讨论。

2. 均衡转移支付

在决定了均衡的资源配置之后,我们可以考虑政治家和银行家间利益的分配:均衡转移支付。转移支付的方向,即由银行家向政治家支付还是由政治家向银行家支付,取决于合谋均衡点和政府控制下的均衡点的相对位置。

若合谋均衡点位于政府主导下的均衡点的右下方(图 2),即冗员增加而管制降低,则在有转移支付的情况下,政治家会向银行家进行转移支付(如给与政策优惠),以较低廉的转移支付来代替昂贵的管制以购买更多的冗员;若合谋均衡点位于政府主导下的均衡点的左上方(图 3),即冗员减少而管制提高,则在有转移支付的情况下,银行家向政治家进行转移支付,以换取较少的给予企业的补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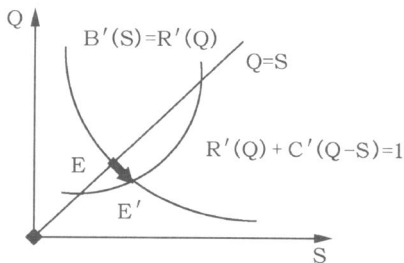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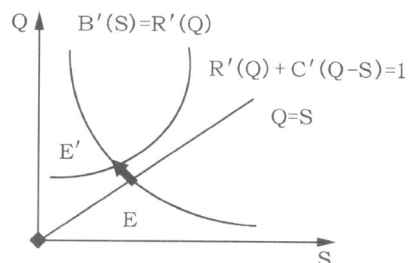


图 3

命题 2 总结了均衡转移支付的性质。

命题 2:政治家向银行家支付转移支付以获取具有更高价值的金融资源;而银行家向政治家支付转移支付以提高利润。各方支付转移支付的目的在于使均衡向其希望的方向移动。

命题 2 的重要含义在于,相对于政治家主导的均衡,在讨价还价的均衡下,Q 以及 S 变动的方向是不确定的。这说明当政府能够干预企业的人员雇佣时,给予银行自主权,甚至完全私有化,并不能形成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即 Q 并不为 0,管制的程度甚至有可能高于政治家主导下的均衡,恶化市场竞争结构。其原因在于,当银行拥有了对于利润的剩余索取权后,银行

更有激励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使政府加强保护并增加其垄断利益。俄罗斯在私有化之后形成的金融和工业寡头就是这个结果的现实描述。

命题 2 在中国可能是另一种情况的发生,即政府以转移支付的方式,而非增强管制的方式从国有商业银行处获取资金。从政治家主导转变为政治家与银行家讨价还价给银行业带来的一个显著的效应就是存贷款利差的变化。事实上,在 1985~1995 年期间,中国的存贷款利差显著低于其他国家。然而,1995~2004 年间,由于银行谈判能力的加强,中国的存贷款利差在 3~4 左右,在平均值上高于日本和荷兰。

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均衡转移支付的金额,转移支付的金额取决于双方的谈判能力,我们考虑纳什讨价还价解:

$$W = [U_p]a[U_b]1 - a$$

均衡的转移支付为:

$$b = [B(S) - R(Q) - C(\cdot) + Q - S] \quad (3)$$

其中 b 是政治家谈判力的表征,政治家控制、影响银行的力量越强,谈判力就越大,给予银行家的转移支付就更低。而改革的过程伴随着转移支付的提高,这反应了政府主动从对于银行业的强力管制中撤出,并增强银行业市场化程度的愿望。 $[B(S) - R(Q) - C(\cdot) + Q - S]$ 是政治家和银行家作为一个联盟能从外部获得的租金,租金越高,银行家向政治家支付的转移支付值越高。我们有命题 3。

命题 3:政治家对于银行的控制力越强,银行家给予的转移支付金额就越高。政治家和银行家联盟的租金越高,转移支付金额越高。

五、比较静态分析

基于均衡式(2),本节讨论政治收益和管制成本的变化将如何影响均衡的资源配置,并分析由此带来的政治家对于国有商业银行影响的变化。

命题 4(政治收益的比较静态):政治家从安排冗员中获得的政治边际利益的提高将导致冗员的增加与对银行业管制的加强;而边际利益的降低将导致对银行业管制的减弱。

证明:给定 $S, B(S)$ 上升将导致 $R(Q)$ 上升,从而 Q 上升, $B(S) = R(Q)$ 向右上方移动。 $R(Q) + C(Q - S) = 1$ 不受影响,均衡的 Q 和 S 均上升。

从图 4 可知,合谋均衡点从 E 移至 E' ,均衡的 Q 和 S 都上升。 $B(S)$ 的提高意味着政治家与银行家的联盟能从一单位的冗员中获得更高的利益,从而联盟增加了冗员的数量,并进一步提高管制以获取更多的垄断收益。由此,模型描绘了由于利益集团能够谋求到更多利益而提高壁垒的过程。由联盟带来的既得利益是管制存在的原因(Krusell, 1996)。同时,模型说明,金融业的垄断源自于政治家迫使企业承担的冗员(林毅夫, 1997, 2003),并且,就业与经济指标对于官员晋升越是重要,官员干预企业进而银行业的激励就越强。

中国银行业管制的大幅度撤销与国有企业冗员程度的降低相伴随。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随着独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政府对于国有企业创造就业的依赖程度降低,即从安排冗员中获得的收益降低。这带来了对于银行业管制的进一步撤销与银行业的放开。1995 年,随着《中央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的颁布,多种所有制的银行开始大量出现,包括城市和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合资以及外资银行。1997 年 11 月,政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会议,推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其中包括:发行 2 700 亿元人民币的政府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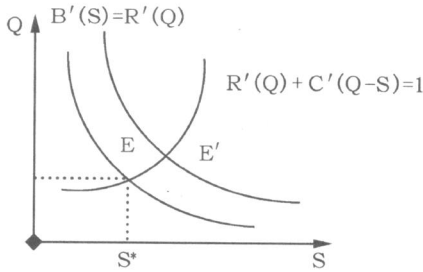


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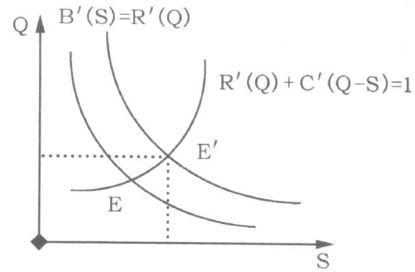


图 5

券,并将其收入注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以增加它们的资产储备;同时,为了提升它们的资产质量,至 2000 年底,通过四个新设立的资产管理公司购买了约 1.4 万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在实施商业化运作之后,一些“四大”银行的分支仍然承担着政治贷款的任务(Jia He, Huge Thomas,2006)。同时,巴曙松(2005)指出,1997 年之后,地方政府逐步放弃直接从国有银行体系夺取资源,而转为通过协助、纵容或默许辖区内企业的“逃、废债”行为等来间接争夺国有商业银行的金融资源。然而,撤销管制和竞争增强在整体上带来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运营效率的提高(Chen ,Skully , & Brown ,2005)。

命题 5(管制成本的比较静态):管制边际成本的提高将导致进入壁垒的降低,以及冗员的减少。

证明:给定 Q,R(Q)上升将导致 B(S)上升,从而 S 下降,B(S)=R(Q)向左下方移动。B(S)=(1-C(Q-S))不受影响。均衡的 Q 和 S 均下降。

从图 5 中可知,合谋均衡点从 E 移至 E',均衡的 Q 和 S 都下降。其经济学含义为:R(Q)的提高意味着政治家与银行家的联盟管制成本上升,从而联盟降低管制水平,同时减少冗员,以保持增加冗员的收益等于提高管制的成本。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凸显了在缺乏一个良好的银行体系下全球化浪潮中隐藏的危险,加强了亚洲各国政府改革本国银行业的决心。更为重要的是,2001 年 12 月,中国正式加入 WTO,并承诺逐步放开银行业,这些都提高了政治家管制银行业的成本,即 R'(Q)大幅度地上升,其结果是管制的下降。2002 年,全国第二次金融会议召开,会上明确提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方向是根据现代股份制金融机构的特点对它们进行股份制改造。其后两年,中国政府对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进行改组,共注资 450 亿美元。2005 年,中国建设银行在香港上市;次年,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和内地同时上市。三大国有银行的上市意味着政府对于它们的控制力度进一步减弱,而在此期间,国有银行撤销了 2 万多个分支机构,推行内部机构“扁平化”,完善业务操作流程的标准化,改变信贷分类标准,对信用风险实施严格管理,通过完善内部治理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六、社会效率

在以上讨论中,模型刻画的均衡是局部均衡,即双方的博弈均衡,而非社会最优结果。这里我们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讨论上述局部均衡的效率及其含义。我们首先分析社会最优均衡,然后讨论社会最优实现的条件,最后以社会最优为基准,探讨冗员对经济绩效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首先,为政治家带来收益 B(S)的冗员通常会造社会损失,假设社会效率净损失为 S。

为了支持冗员这一低效的安排,政府需同时实施更多的低效制度安排,其中之一便是管制银行业。管制所带来的超额收益是以牺牲其他中小银行以及储蓄者的收益为代价的,管制成本 R 本身也是社会的效率净损失。因此,管制所带来效率损失通常要高于 R ,我们记为 kR ($k > 1$)。冗员和管制的社会总收益为 $-S$ 和 $-kR$ 。从社会效率的角度来看,社会最优的选择为 $R = 0, S = 0$,即不安排冗员,也不实施管制。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当经济中存在这样的合谋时,如何能够降低效率损失、达到或者靠近社会最优点?上述比较静态分析表明,政治收益的降低、管制成本的提高都有可能提高社会效率。但只有在管制成本无穷大或者政治收益无穷小的情形下,社会最优才能实现。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以上所有的讨论中均假设转移支付的成本为零,即政治家和银行家之间的联盟是合法的,从而科斯命题成立。但现实中,转移支付的交易成本可能是很高的,我们先考虑一种转移支付成本极高,因此没有转移支付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给定银行家不给企业补贴,政府将不对银行进行管制;同样,给定政府不管制,银行家也不给企业补贴。因此,社会最优点,即 $R = 0, S = 0$ 是一个纳什均衡。上述论述可以总结为命题 7。

命题 7:从社会效率的角度, $R = 0, S = 0$ 为最优选择;存在转移支付时,政治收益的降低、管制成本的提高都有可能提高社会效率,在极限情形下达到社会最优。在不存在转移支付时,社会最优是一个纳什均衡。

均衡偏离社会最优会带来社会效率的净损失,经济绩效低于社会最优水平。进一步,社会管制水平越高,冗员数越高,社会经济绩效越差。

由于冗员和管制并不创造社会财富,而仅仅是资源的转移,是部分经济主体对其他经济主体资源的掠夺。实际上,管制水平的提高造成了经济个体之间的机会不平等。在现实中,机会不平等往往偏向于具有更高政治、经济地位的人,这种机会将恶化结果的不平等。直观的讲,在管制中,富人往往有更大的可能获取垄断的地位来掠夺穷人,并使收入分配不断恶化。在上述模型中,管制导致财富 Q 从经济的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转移,实际是穷人补贴富人;冗员 S 导致政治收益 $B(S)$ 从政治的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转移。这种转移的结果是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的加剧。上述论述可总结为命题 8。

命题 8:管制水平和冗员人数越高,社会经济绩效越差,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程度越高。

七、小 结

本文探究了国有商业银行处于垄断地位却盈利能力低下的政治经济学原因。文章指出,银行向低效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的负担源于政治家通过冗员获取政治利益的意愿。事实上,国有商业银行类似于国有企业,其功能有着很强的政策性。中国的国有企业和中国的银行体

表 1 2006、2007 年三家国有上市银行盈利情况

单位: %

银行名称	总资产净利润 ROA 2006 年	总资产净利润 ROA 2007 年	净资产收益率 ROE 2006 年	净资产收益率 ROE 2007 年
工商银行	0.7064	1.0125	13.4543	16.1508
建设银行	0.9232	1.1479	14.9985	18.3875
中国银行	0.936	1.095	13.489	13.8486

数据来源: Wind 资讯。

系都背负着为了实现政治利益而施加的负担,而国有商业银行绩效提高的必要条件是政策性负担的剥离(林毅夫,1997,2003)。进一步,文章揭示官员政绩考核方式的改变与金融市场的开放都能削弱政治家与银行家形成联盟的力量,从而提高整体社会的效率。

伴随着政府职能从直接干预转向市场调节,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逐步走向有序、正常。表1显示,与2006年相比,三家国有上市银行2007年的盈利状况都有显著改善^①。以此,我们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中国银行业将会同样呈现出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

注释:

作者感谢两位导师林毅夫教授和姚洋教授的指点与评论,文责自负。

参见 Timewell, Stephen (2005) *The Top 1000 World Banks*, *The Banker*, 155, 209~326。

譬如,中国银行的税前利润率为1.18%,与前一位的法国巴黎银行(2.83%)以及后一位的西班牙国际银行(1.80%)相比要低很多。这一差异在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上表现得更为显著。中国农业银行0.22%的利润率与其排名前一位的法国大众银行(0.76%)和后一位的华盛顿互助银行(1.23%)相差甚远。数据来源:Wind资讯。

数据来源:《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司,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版。

对于L和B(L)的理解是可以非常宽泛的。事实上,一切能够给政治家带来的收益的负担都可以理解为L,包括冗员、社会保障等社会性负担和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等战略性负担(林毅夫,1996)。

中国银行业管制包括严格的准入限制和存贷款利率限制等,这些政策都旨在保护国有银行,提高国有银行收益。

对于R的理解并不局限于管制所需的直接成本。事实上,一切因管制而可能给政治家带来的成本都应看作管制的成本,比如因管制影响到市场机能的发挥,从而影响到经济绩效,进而影响政治家升迁等成本都应计算在内。

数据来源:中宏数据库。

限于篇幅,我们将证明部分省去,感兴趣的读者可直接向作者索要。

①限于篇幅,我们将证明部分省去,感兴趣的读者可直接向作者索要。

②因受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的不利影响,中国银行ROA、ROE提高幅度较小。

参考文献:

- [1]Chen, X. G., Skully, M., Brown, K. Banking efficiency in China: Application of DEA to pre-and post-deregulation eras: 1993 - 2000[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5, 16, 229~245.
- [2]Cull, R., Xu, L. Bureaucrats, State Banks, and the Efficiency of Credit Allocation: 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0, 28(1): 1~31.
- [3]Demsetz H. and Lehn, K. The Structure of Corporate Ownership: Causes and Consequences[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5, 93(6): 1155~1177.
- [4]Lin, Justin Yifu; Cai, Fang and Li, Zhou. Competition, Policy Burden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 (2): 422~27.
- [5]Lin, Justin Yifu, and Tan, Guofu. Policy Burdens, Accountability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9, 89(2): 426~31.
- [6]Lin, Justin Yifu.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Convergence[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3, 51(2): 277~308.
- [7]Mathias and Maskin. Credit and efficiency in centralized and decentralized economie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October 1995, 62 (4), :541~55.
- [8]Qian Yingyi., G. Roland.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V 88, 5, 1143 ~ 1162.

- [9] Shleifer, Andrei, Vishny, Robert W. Politicians and firm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November 1994, 109(4): 995 ~ 1025.
- [10] Shleifer Andrei, S. Djankov, R. Sa Porta, and F. Sopez-de-SiSaned. The regulation of Entry[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February, 2002.
- [11] Stein J. C. Information production and capital allocation: decentralized versus hierarchical firms[J]. Journal of Finance, 2002, LVII, No. 5. 1891 ~ 1921.
- [12] Jia He, Hugh Thomas. Asian Banks Competitiveness Ranking " Report, 2006.
- [13] Xiaochi Lin, Yi Zhang. Bank ownership reform and bank performance in China[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8.
- [14] 巴曙松, 刘孝红, 牛播坤. 转型时期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地方治理与银行改革的互动研究[J]. 金融研究, 2005, (5).
- [15] 林毅夫, 蔡昉, 李周. 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16] 林毅夫, 蔡昉, 李周. 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 增订版,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17] 林毅夫, 李志赞.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D].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论文, 2003.
- [18] 谢平, 焦瑾璞. 中国商业银行改革[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 [19]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统计司. 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C].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
- [20] 钟伟, 巴曙松, 高辉清, 赵晓. 中国金融总体风险评估报告[R]. 2002.

A Political-Economic Explanation for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Lack of Scale Economy in China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ZHONG Ning-hua, CHEN Bin-kai

(China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aspect of political economics, the paper states that there exist high market concentration rate, low profitability and high ratio of bad debts in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t extends the thoughts of Shleifer and Vishny about politicians and firms to the financial sector, and combines market structure with politicians' prefer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ig monopoly banks are the optimal choose in the politician-led economy. When there exists a way to exchange benefits between politicians and bankers, politicians can be in cahoots with bankers. And the exchange amount depends on the negotiation power of two parties and the gross rent obtained through the collusion. Further more, both the change of official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and opening-up of financial market can weaken the collusion power and improve social efficiency.

Key words: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collusion; transfer payment

(责任编辑:一天)